

马克思、恩格斯舆论思想内涵研究

王灿发 邢 祥

内容提要 基于前人的研究认知，结合当时社会生产和发展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论述了舆论的本质与特征、舆论的主要载体和舆论的社会作用，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舆论思想内涵。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舆论思想

舆论是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重对舆论的研究和论述，在他们的著作中，“舆论”的概念出现了 300 多次，^[1]他们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论述了舆论的本质与特征、舆论的主要载体和舆论的社会作用，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

一、舆论是一种“一般关系的实际体现和鲜明的表现”，是“不可数的无名的公众的意见”

产生于 16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其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成熟，但是“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2]空想社会主义者注重研究舆论，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里都对舆论的认知贡献了研究主张和思想材料。1516 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就提出“凡属认为重要的事都要提交摄护格朗特会议，由摄护格朗特通知各人所管理的住户，开会讨论，将决定报告议事会。有时问题须交全岛大会审议”。^[3]进入 18 世纪后，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注重利用报刊来宣传主张，将报刊作为无产阶级进行舆论宣传的工具。在巴贝夫和菲·邦纳罗蒂看来，“借助报刊舆论的赞扬来表彰勇敢、敏捷、节制、谦虚、热爱劳动以及其他种种体力上和精神上的优良品质，批评一些不良现象。”^[4]19 世纪初，以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将报刊作为舆论引导和政治教化的重要工具。如圣西门将舆论界定为“世界的女皇”，认为“在任何国家都有一种力量高于政府，这就是舆论的力量”。^[5]尽管空想社会主义的舆论观念受当时的资本主义影响，具有一定的不成熟性，将舆论的作用进行了夸大，但是他们从事的报刊活动和提出的舆论主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舆论思想观念提供了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的舆论思想观念是在继承前人认知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生

产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批判、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将舆论视为“一般关系的实际体现和鲜明的表现”，^[6]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公众舆论”，^[7]他们认为舆论是“不可数的无名的公众的意见”，^[8]反映了“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9]也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的一种交往形态”。^[10]这与雅克·卢梭和黑格尔等人对舆论的认知有一定的相似性和传承性。卢梭对公共舆论的界定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舆论概念起源。18世纪，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public”（公众）和“opinion”（意见）组合起来表示“舆论”，认为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公众的意见。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个人所享有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这种自由，集合地表现为我们所称的公共舆论。”^[11]

二、舆论具备一定的阶级性和不稳定性，其表达与政治意识发展有关

舆论作为一种意见的表达，与表达主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涉及的利益阶层息息相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及舆论时会在前面加上国别、地区、行业、阶层等限定词语。虽然舆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和普遍性，但还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中，“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们对一件事情的一致态度”，^[12]代表和反映了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如“俄国的舆论实质上有着鲜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性质”。^[1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舆论也是“晴雨表”，阶层越先进、地区越发达，越容易成为当时舆论的“晴雨表”。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派在议会选举中失败，马克思在《〈勒·勒瓦瑟尔回忆录〉摘要》一文中指出，这源于吉伦特派“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14]而雅各宾俱乐部受巴黎公社的影响，吸引了许多具有刚毅品质和爱国精神的先进代表，成为“公众舆论的晴雨表”，^[15]因此能够在受到民众的推举，建立起雅各宾专政。

社会舆论并非固定不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舆论具有不稳定性，会受战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会随着利益的改变而改变，“‘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16]1870年，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入侵普鲁士，战争爆发时，英国舆论是非常同情普鲁士，但当普鲁士防御胜利后转而入侵法国时，英国国内舆论立马发生改变，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道：“在咖啡馆里，唱《守卫在莱茵河上》的德国歌手都要被嘘下台来，而唱《马赛曲》的法国歌手却博得别人齐声伴唱。除了人民群众对共和国的坚决同情、上流社会对明如白昼的俄普同盟的恼怒，以及普鲁士外交在军事上获得胜利以来所发出的无耻腔调以外，进行战争的方式——征集制度、焚毁村庄、枪杀自由射手、扣留人质，以及令人想起三十年战争的种种暴行，在这里已经激起了公愤。”^[17]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舆论也会受到一些统治者和社会活动家的言行的影响。“社会舆论易于

受个别人物突然垮台的影响，却不大去细心观察整个机关的逐渐衰落。群众只有在危险相当大了并且已经感触得到的时候，才会慌张起来”。^[18]俄国将很大一块的波兰领土让给了普鲁士和奥地利，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将舆论引入歧途，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三》一文中指出“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宫廷变成了当时有教养的人士、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这位女皇和她的宫廷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她竟然能够把舆论引入这样的迷途，以致伏尔泰和其他许多人都歌颂‘北方的塞米拉米达’，宣扬俄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祖国，是信敬自由的维护者。”^[19]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著中多次提及“共同体”的概念。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产生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0]“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每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21]他们认为较大范围的舆论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1829年，俄国舰队违背了不得在地中海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协定，封锁了黑海出海的众多港口，马克思在《战争——议会辩论》一文中指出“这种封锁威胁到了英国在列万特的贸易，使当时英国的通常是蒙眬欲睡的舆论激动起来了，并引起了对俄国和对内阁的抗议怒潮……英国舆论随时准备对俄国进行敌意的攻击，不列颠政府对此就不能经常置之不顾，而且在同民族偏见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指海上权利）向舆论挑战是危险的。”^[22]

公民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对政体建立和稳固起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舆论的表达与政治意识发展有关。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社会舆论是个人政治态度形成的主要途径，对公众的政治意识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公众的政治意识越成熟，越促进社会舆论的表达。当时社会公众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政治生活开始活跃起来。“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法国除外），现在俄国容许自由议论的程度是可笑的和微不足道的，但是了解尼古拉俄国的人们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农奴制的废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与此同时，俄国社会上比较有学识的人士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又完全是一种吉兆。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也活跃起来了。”^[23]恩格斯在《参加巴登议会的辩论》一文中，论证了政治意识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政治意识越发展，普鲁士的社会舆论表达得越自由和越响亮……在普鲁士和立宪制的德国之间的社会舆论中长期存在的壁垒崩溃了，民族分裂已不复存在了”。^[24]在文中，恩格斯还提及公众对自由的追求“随着在普鲁士建立了比较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我们祖国南北这两大部分才在一致追求自由的愿望下越来越明显地融合起来”。^[25]

三、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

19世纪30年代末，面对当时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革命报刊活动，运用报刊来揭露和批判社会弊端，他们认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26]报刊的使命除了信息传递、社会沟通之外，主要的职责就是反映社会舆论和引导社会舆论。“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27]是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具有各种各样色彩和深刻矛盾的舆论定会找到相应的报刊”，^[28]例如“石印通讯是奥地利当局出版的半官方出版物，目的是根据需要影响社会舆论”。^[29]马克思将“社会舆论比作袋子，把报刊比作驮袋子的驴，也就是说，报刊是驮袋子——‘驮’社会舆论——的‘驴子’，即报刊是表达、反映、体现、复述社会舆论的一种载体。社会舆论和报刊的关系——‘袋子’和‘驴子’的关系”，^[30]“为了打驴背上的袋子——即公众舆论——而去打驴子”。^[31]

“‘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32]要“持续不断地影响舆论”。^[33]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时提出：“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因此，这也是《新莱茵报》的任务，随着政治讨论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它将越来越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这一任务上来”。^[34]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招股启事》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只有编辑部能够以后一期跟着—期间隔时间更短地出版，这个企业才会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而在经济方面也才会有很大的希望”。^[35]只有报刊才能将私人利益为普遍利益，“才能使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注意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减轻这种贫困状况，只要它使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状况的存在就行”。^[36]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报刊并不等于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眼中，并非所有的报刊都能起到积极指导舆论的作用，也分“好”与“坏”，“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呢？因此，谁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37]以英国的报刊为例，马克思在《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英国的舆论》《英国记事》等多篇文章中对英国的《泰晤士报》等报纸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们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为当局的决策鼓而呼，将它们称为“黄裤奴”^[38]和“婆罗门”。^[39]在《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在国内改革方面，《泰晤士报》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是“指导舆论”，

而是根据国内形势，“屈从于舆论”。^[40]

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舆论工具的报刊，“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41]报刊的匿名性是由报刊的实质所决定的，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认为报刊文章不署名，才更有可能使个别意见转化为理性观点，“作者的名字可以使一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明显地区别开来，正如身体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别开来一样，可是他的名字也会使每篇文章的作用——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化为乌有。最后，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而且还可以使广大读者更为自由和公正，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在自己面前看到的就不是说话的人，而只是所说的事；那时读者就摆脱了作为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42]

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作补充，即新的新闻出版法……最后，规定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单户期票，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43]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使舆论了解真相是纠正舆论的最可靠的办法。^[44]报纸只有真实、客观、准确表达和反映社会舆论，才能正确引导和影响社会舆论，这也是报刊取信于公众而赖以生存的条件。1854年10月，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传遍全世界，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也专门就此事发表社论，然而后来证实是虚假消息，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今天英国舆论清醒过来了：关于没有围攻就占领了大要塞的似是而非的消息原来是一场无情的骗局，它使得报纸以后要谨慎从事。”^[45]恩格斯在《致〈社会明镜〉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一文中说“我们将无情地把每一个压迫工人的事件提交舆论谴责，而且将对我们的撰稿人就这类事件撰写的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时间的最确切的报道，表示特别的感谢……总而言之，资本家不管在什么地方对待工人有任何不公正的行为，我们都要请每一个能够向我们报道这类消息的人，尽快地寄来确实的报道。我们打算把一切违反为保护穷人不受富人欺压而制定的法律的行为，以及每一个这样的违法行为的卑鄙无耻的情节都公之于众。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目前还只是一纸空文的法律真正有效。”^[46]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报刊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乃是一切精神关系的基础，要对真正的国家大事进行原则性讨论，它是完全必要的”，^[47]“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封不动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送到国王宝座的阶梯前面，这在国家权力前面，在这种权力面前，没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差别，而只是些不分

亲疏的公民而已。”^[48]他们厌恶政府或党派操纵那些并非官方或党派报刊所造成的虚假舆论状态，无论它表现为意见一致还是有意安排的各报刊的争斗。^[49]除此之外，报刊需要得到人们的支持和信赖，“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50]在政治反动的条件下，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和革命民主主义报刊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利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来联系群众并促成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舆论，来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51]

四、作为“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舆论可以发挥“批判的法庭”的作用

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思想家们冲破封建神学的束缚，探讨政治秩序能够持续稳固的方法。例如马基雅维利认为权力组织和政治家们想要取得民众支持主要通过暴力和说服两种方式，因此舆论、宗教、军队和法律必不可少；洛克将“人民的同意”设定为国家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将行政权力、立法国民议会的权力和报纸的权力统称为国家的三种权力，这三种权力或互相制衡或相辅相成，认为“占有他人的意志是统治关系的前提”，^[52]舆论的力量不容忽视，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53]在此过程中，各方舆论主体相互作用，通过博弈进行观点与意见的置换，从而影响社会格局。因此，占领舆论阵地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观点，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54]他们在《谢林论黑格尔》一文中指出，在德国“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即争夺对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55]“俄国向来就知道尽可能使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也没有忘记去争取这种舆论”。^[56]为了寻求民意支持和确保政策推行的顺畅，即使是统治阶级也十分重视社会舆论的力量。因此，社会舆论具有“对权力组织和政治活动家的制约力量”。^[57]就连国王亦是如此，普鲁士国王在颁布等级制帝国宪法时，也不能大胆推行，而是“先用这套办法试探一下舆论，然后还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收敛那些太过火的措施”。^[58]

舆论在制约它们的同时，还有可能受制于它们。在旧欧洲的专制制度下，权力组织对舆论的控制是严厉而简单的，即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有的还借助宗教裁判所，禁止一切与权力组织不一致的意见发表和流通。^[59]其实依靠暴力镇压来维持的统治得不到民心，人们对其只是胁从，这样的统治一定不会长久和稳固。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暴力永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获得和维护权力，君主应当善于使用欺骗来维护自己的权力。^[60]因此，统治阶级仅仅靠必须使自己的统治获得普遍认同与支持，给自己的统治“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61]现代社会统治阶级十分注重操控舆论，而且采用的方式较为多样化。比如权力阶级采取制造舆论的方式操控舆论，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的欧洲》一文中，分析亚历山大二世为了奠定制度基础

而营造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为了使他们的支持成为现实，他必须制造一种社会舆论，至少应该创办报刊之类的东西。为此放松了检查，容许展开文雅的、善意的、有礼貌的讨论，甚至允许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轻微的客气的批评。”^[62]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在确保自身地位稳固的基础上，让舆论有所体现，作为“减轻舆论压力的安全阀”。^[63]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控制方式一律采用批判的态度，无论控制舆论的外衣多么华丽，其丑恶的本质是无法被掩盖的，只是权力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权宜之计，都是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

马克思认为舆论能够推动立法，是“国家立法的最丰富、可靠的和生气勃勃的源泉”，^[64]“能够影响立法的舆论，通常不是某一方面的舆论，而是综合性的普遍的舆论”。^[65]在18世纪末，英国工人阶级寻求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时长。但是到19世纪60年代，陶瓷业、火柴制造业、纺织业、面包业等部门的资本家为攫取更多的利润，使工作时长延长到14至18小时，甚至20个小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进行了专门论述，以面包业为例，“在英国，没有一个工业部门象面包业（刚刚兴起的机制面包业不算在内）那样，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如此古老的、只有从罗马帝国时代的诗人作品里才可以看到的纪元前的生产方式。”^[66]面包工人也被认为是“短命的工人”，因此“1858-1860年，爱尔兰的面包工人自己筹款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来反对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公众怀着爱尔兰人的热情表示站在工人一边，例如在都柏林1860年的五月大会上就是这样。由于这一运动，只做日工的规定才在威克斯弗德、基尔肯尼、克郎梅尔、瓦特福德等地真正有效地得到执行”。^[67]恩格斯在《英国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一文中指出“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引起社会注意的时期，社会上一切自身利益受到产业革命损害、生存受到这一革命威胁的派别都和上述这种人联合起来了。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船主、商人、土地贵族、西印度的大地主、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这样的时期中都日益在10小时工作制的那些宣传者的领导下团结起来。10小时工作制法案给这些反动的阶级和派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工业资产阶级。”^[68]虽然这种联合推动法案通过花了30多年的时间，但是最终取得成功，这也是工厂主们“怯懦地向舆论让步”^[69]的结果。舆论对立法的影响还在于促成某些法律的废除。1844年英国遭遇金融危机，罗伯特·皮尔爵士推崇的银行法在平时就不起作用，在危机中更是加剧金融恐慌，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一文中指出“当真正的金融困难这样被人为的恐慌加剧以及当它造成大量牺牲的时候，政府往往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使这项法律恰好在本来需要它来应付局面，而且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起某些作用的时期停止生效。例如，1847年10月23日，伦敦的大银行家曾前往唐宁街求援，即要求停止实行皮尔的银行法。”^[70]

舆论的力量还体现在舆论监督上。伴随着工人运动和工人报刊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舆论监督观逐步成熟。马克思使用过“舆论陪审团”“名誉审判席”“批判

的法庭”等等用语，恩格斯使用过“舆论的权力”“诉诸公众”“诉诸公论”等等用语，其意思是一样的，即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周围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的制约。^[71]他们认为“一切生物只有在开阔的室外环境中才能繁茂，真正的政治会议也只有在公众精神的密切保护下才能昌盛。”^[72]舆论也是如此，公开是舆论实现社会监督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重言论出版自由，作为舆论的主要载体，自由报刊具备社会批判作用，“以意识到自己崇高的目标的（虽然是尖锐的）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国家机构的活动”。^[73]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制度》中，马克思剖析和驳斥了书报检查制度的虚伪性，认为“报刊不仅被剥夺了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74]当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公开后，统治阶级就像身处在舆论的法庭中，感到无形的监督力量，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指出“普鲁士政府已经使自己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原告方面为了面子不得不辑出证据，而法庭为了面子也不能不要求证据。法庭本身已经站在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面前。”^[75]

五、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欧洲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他们的舆论观不是仅停留在意识方面，而是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进行阐释。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重要成果，马克思、恩格斯的舆论思想内涵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为当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价值观念。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注释

- [1] 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 [2] 张昆、陶喜红 《论空想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思想》，《新闻学论集》（第19辑），2007年。
- [3] 〔英〕托马斯·莫尔 《乌托邦》，戴镗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5页。
- [4] 张昆、陶喜红 《论空想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思想》，《新闻学论集》（第19辑），2007年。
- [5] 〔法〕昂利·圣西门 《论蜜蜂与胡蜂的不和或生产者与不事生产的消费者的彼此地位》，《圣西门选集》第3卷，董果良、赵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8页。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5页。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23页。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58页。
- [10] 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 [1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16页。
- [12] 童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3页。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08页。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4页。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4页。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24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67页。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15页。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81页。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页。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0页。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17页-318页。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96页。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7页。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7页。
-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页。
-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3页。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9页。
-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7页。
- [30] 童兵 《舆论和舆论载体——报刊》，《新闻与写作》1991年第7期。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58页。
-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1页。
-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08页。
-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9页。
-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600页。
-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1页。
-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91页。
-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3页。
-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90页。
-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35页。
-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3页。
-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12页。
-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3页。
-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18页。

-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57页。
-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5页。
-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0页。
-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1页。
- [49] 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3页。
-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4页。
-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47页。
-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3页。
-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7页。
-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9页。
-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7页。
-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81页。
- [57] 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41页。
- [59] 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3页。
- [60] 黄丹 《马克思政治社会化思想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5页。
-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96页。
-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52页。
-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9页。
- [65] 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9页。
-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7页。
-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1页。
-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78页。
-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8页。
-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41-342页。
- [71] 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
- [73] 许新芝、罗朋、李清霞 《舆论监督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1页。
-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63页。

5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n Public Opinion

• *Wang Canfa, Xing Xiang*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es, combin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demonstrate the essence,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carrier and social funct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has spontaneity and universal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public opinion can represent and reflect the interests of a certain class, class and group, and its demands. It has certain instability, and can be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war, interests, and the words and deeds of rulers and social activists.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 is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 The press is the main carrier of public opinion. Marx and Engels made good use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o influence and guide public opinion. In their view, the premise is that the newspapers expresses and reflects public opinion in an authentic, objective, and accurate way. In terms of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ublic opinion, Marx and Engels think public opinion as a universal, covert, and coercive force.

15 Marking the “Site of Memory” With Numbers: A Case Study of the Memorial to Victims in Nanjing Massacre

• *Huang Shuming*

The History Textbook Event taking place in Japan in 1982 had instigate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which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morial for Victims in Nanjing Massacre as a site of memory. Seven numerical signs have gradually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Memorial and weaved into a unique network of sign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lace as assemblage,”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se signs and the micro assemblages in which the former are embedded have been produced in particular forms of materiality, how they exercise their functions of spatial defini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respectively, how they have produced multiple discourses by means of metaphorical mechanisms, and how they have been triggering or accommodating a variety of practices of memory with certain scripting effects. These memory works that revolve around numerical sign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lace identity of the Memorial.

38 From “Brothers” to “Them”: The Evolution of the Terminology for Victims of Man-made Disasters in China (1949 - 2016)

• *Yan Yan, Zou Wenxue*

While individual death is the end of physical life, how death is defined, presented, and communicated are